

# 小川尚義與高本漢 漢語音韻研究重要史實辨正 ——向洪惟仁教授請益一<sup>\*</sup>

李無未<sup>\*\*</sup>

## 摘要

針對洪惟仁教授關於日本學者小川尚義和瑞典學者高本漢在世界範圍內漢語音韻研究史地位及相關問題研究進行了評述。認為，他對小川尚義在漢語音韻學史上研究的地位評估確有用心「拔高」之嫌。論文中涉及到一些有關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的重要結論與史實不符。將漢語和閩南語作為兩個學科範疇並列是錯誤的；小川尚義不是世界範圍內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漢字音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戰前日本唯一的漢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的觀點也是不對的；小川尚義漢語比較研究不是唯一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小川尚義「古今漢字音對應表」不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張表；小川尚義不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小川尚義中古音「擬音」及與其他方音比較存在著明顯的「邏輯謬誤」；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不是

---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東亞珍藏明清漢語文獻發掘與研究》（編號：12&ZD178）資助成果之一。在寫作過程中受到許多學者的指教，特此致謝！

\*\* 作者為中國廈門大學特聘教授

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最先將高本漢學術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的不是羅常培，而是林語堂；小川尚義「擬音」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伊沢修二不是民間學者，其純語言學的漢語語音實驗語言學研究和其他語言比較研究在世界範圍內具有重要地位。本文認為，小川尚義的語言學學術源流在日本，如果我們不去看小川尚義和日本的學術源流關係，很顯然，對小川尚義的學術評價就不會到位，與高本漢漢語音韻學的比較也就顯得不合理據。站在世界漢語研究史的角度上看，小川尚義之前或同時代學者，對漢語語音學研究的貢獻也不可忽視，必須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而進行研究。

**關鍵詞：**臺灣洪惟仁 日本小川尚義 瑞典高本漢 重要史實辨正

小川尚義（1869年3月21日－1947年11月20日）是日本明治至昭和前期的漢語音韻學、方言學和臺灣南島語言研究者、辭書編纂者。師從具有日本「現代語言學之父」之稱的上田萬年教授，1896年從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博言學科畢業。同年10月，赴任臺灣總督府學務部勤務。後任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現在臺北教育大學、臺北市立教育大學等）教授、兼任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長。1930年任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教授。1936年退休。獲日本學士院恩賜賞。不久，回歸故鄉日本松山縣。有學者稱之為「臺灣語言學先驅」、「臺灣語言學之父」。

洪惟仁教授《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是20多年來在漢語音韻學史研究上頗具影響力的一篇論文。<sup>1</sup>很明顯，這篇論文對確立日本學者小川尚義在世界範圍內漢語音韻研究史上應有的學術地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可以肯定的。比如他說：「從漢語語言學史的觀點，對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的成就做一個評價。」（44頁）「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不能不佔有一席之地。他被歷史所埋沒，不是因為他的研究在當時水準不夠，而是歷史的捉弄。」（44頁）並以比較的形式，用大量史實說明高本漢和小川尚義各自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術特點以及所做出的突出貢獻，進而突出小川尚義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術價值。但筆者閱讀後感到，洪惟仁教授對小川尚義在漢語音韻學研究地位的評估確有用心「拔高」之嫌，論文中涉及到幾個有關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的重要結論與史實並不符合實際，並且，將小川尚義「擬音」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由此，引起了我們的討論興趣。以下是筆者的辨正與請益的內容。

## 一、關於小川尚義漢語音韻研究史實的辨正

（一）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上的開拓性問題。洪惟仁教授稱，小川一生的研究跨越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三個領域，並且在三個領域的學術性研究都是開拓性的。（6頁）

---

<sup>1</sup> 洪惟仁教授《小川尚義與高本漢漢語語音研究的比較——兼論小川尚義在漢語研究史上應有的地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臺灣史研究》1.2：26-84頁，1994。

這裏存在著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比如將漢語和閩南語作為兩個學科範疇並列。與此相關的還有幾處也是這樣，比如洪惟仁教授說：「博言科培養的學生後來在日本語、愛奴語、琉球語、朝鮮語、阿爾泰語、漢語、臺灣語、南島語、俄語等都有專家。小川尚義是上田萬年回母校任教所培養的第一個高足，也是唯一的漢語、臺灣閩南語、南島語的專家。」（3-4頁）這裏的臺灣語就是閩南語，與漢語並列。洪惟仁教授還說：「小川尚義的名字本來只有少數研究閩南語、南島語的學者知道，至於他在漢語語言學的成就知道的就更少了。依筆者所見，曾經撰文介紹小川尚義在漢語語言學的業績的只有吳守禮（1955）、村上嘉英（1966, 1989）、洪惟仁（1992）數篇而已。小川在學術界的知名度主要是閩南語和南島語，漢語方面可謂默默無聞。」（32頁）這裏也是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並列，其實，這樣表述並不合適。閩南語是漢語的一種方言，不是獨立的語言。李方桂在1937年曾發表了《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1973）一文，被認為是最早研究中國境內語言和漢語方言分類的重要論文之一。<sup>2</sup>他把研究漢語方言分類與研究中國境內語言的語系分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是具有超越一般學者研究漢語方言分類的「闊大」眼光的。李方桂說，把中國的語言分成語族和語系，而在每群下面列出該群與其他語群相區別的特徵，其目的是為了引起讀者的注意。將中國境內語言分為印一支語系、南一亞語系、阿爾泰語系，以及幾種有文獻遺留的，但已經不存在的語言，比如吐火羅語、西夏語、契丹語等。語系之下區分語族。比如印一支語系，分為漢語族、侗一臺語族、苗一瑤語族、藏一緬語族四類。漢語族之下。漢語方言劃分為九個群。主要是：北方官話群、下江官話群、西南官話群、吳語群、贛一客家話群、閩語群、廣州話或稱粵語群、湘語群、某些孤立的群。他對每一個群地理分佈和語音特徵進行了說明。語群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幾個次群。閩南語應該屬於語群之下的次群。他的這個分類，成為許多學者研究的標準之一，在漢語方言學史研究上具有重要標誌性意義。張琨《論漢語方言的分類》（1992）說，李方桂在1937年英文版

---

<sup>2</sup> 李方桂在1937年曾發表了《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英文《中國年報》，1973年《中國語言學報》重印；中國大陸《民族譯叢》1980年第1期1-7頁，梁敏譯文，根據美國《中國語言學報》創刊號。

《中國年鑒》（*Chinese Year Book*）上發表了一篇講中國境內的語言和方言的文章，奠定了漢語方言分類的基礎。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1982）稱，李方桂在1937年發表的《語言和方言》一文，把漢語方言分為八大支，與趙元任對漢語方言分區的看法大體接近，只有細微的不同。李先生用若干語音演變的現象說明各方言的特徵。閩南語是漢語方言中的一個「群」或次方言區，並不是獨立的語言。<sup>3</sup>

就是小川尚義自己也不是將漢語、閩南語、南島語並列的。比如《日臺大辭典》（1907）小川尚義「序言」第一章「關於臺灣的語言」，認為在臺灣的人使用語言有三種：日語、支那語、蕃語。在「支那語」之下列有南部福建語、客人語（又廣東語）、其他支那語三大類。在「南部福建語」之下，列有漳州語、泉州語。可見，小川尚義對臺灣語言類別認識是清楚的，閩南語只是「支那語」之下的「南部福建語」而已，不是獨立的語言。<sup>4</sup>

洪惟仁教授在「論文內容之比較」一章之下「關於研究之目的」一節中說：「小川尚義為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而作現代漢語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比較，為了解今音的分歧，作了中古音擬測。」（9頁）卻又把閩南語作為漢語方言來對待，前後並不一致，是不是自相矛盾？

洪惟仁教授關於小川尚義在漢語，包括閩南語研究上為開拓性的觀點是值得推敲的。比如漢語，漢語的研究範圍很廣，是漢語史，還是現代漢語研究，洪惟仁教授的表述都是不清楚的。如果把小川尚義看作是日本人的話，在他之前日本學者研究漢語，並具有重要性貢獻者數不勝數。以文字論，有岡田正之《支那文字史》（1890）；以語法論，有大槻文彥《支那文典》（1877）、岡三慶《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以音韻論，有岡本保孝《韻鏡考》（1850）；以方言論，有柳沢退藏《粵東俗字便蒙解》（1870）等。如此看來，小川尚義漢語研究恐怕就不是最早

<sup>3</sup> 張琨《論漢語方言的分類》，《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1《漢語方言》1-22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年5月；丁邦新《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14.1.2：257-273。收入198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sup>4</sup> 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臺灣總督府，1907。

的，談他在漢語的研究是開拓性的，還是有嫌牽強的。關於這一點，後邊還會說明。儘管如此，說他在臺灣南島語研究上具有開拓性，就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文獻情況來看，這個觀點則是成立的。

（二）小川尚義不是世界範圍內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日本漢字音與漢語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洪惟仁教授稱，小川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漢字音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雖然古音擬測並非小川文的主要目的，可是由於小川尚義是第一個做漢字音廣泛比較的人，他的擬測也不是興之所致的猜度，他也是第一位做科學擬音的人，以現在的眼光來看，他擬音的結果比較高本漢更合理（見本文2.8.關於古音擬測）。（12頁）

據我們調查所知，小川尚義不是世界範圍內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日本等國家語言漢字音與漢語方言比較的語言學家。且不說在世界範圍內觀察，就是在日本，也是如此。

筆者在《日本〈東音譜〉（1719）所記漢語方音問題》（2014）提到，《東音譜》「五十字母音釋」由日本學者新井白石（1657-1725）於享保四年（1719）完成，收於《新井白石全集》第四卷中，又可見於福井久藏撰輯《國語學大系》第三卷「音韻一」中，日本東京國書刊行會出版，1940年初版，1981年再版。討論《東音譜》「五十字母音釋」問題，依據的是1981年再版所刊本（67-80頁）。<sup>5</sup>

《東音譜》體例：正文前是稱為「原君美」（新井白石，名君美）的作者所寫《東音譜序》。《東音譜序》回顧中國和日本的交往歷史以及語音研究、《東音譜》製作等相關問題：《五十字母音釋》下有雙行小字注：「東音，即此間方言。今所用字皆取舊事本紀，《古事紀》、《日本書紀》等所用而與本音相近者，杭泉漳福各州音並系長崎港市舶務都通事所填者。」然後是《音釋》，依五十音圖次序排列。圓圈之內漢字標音，比如「惡平聲」，這之下是片假名ア，假名之下是音釋：「東音阿，泉音鴉，杭漳並同，福音亞，鴉亞音同。」

《東音譜》「五十字母音釋」是長崎唐通事把日語五十音依據漢語四種方音進

---

5 李無未《日本〈東音譜〉（1719）所記漢語方音問題》，《東亞視閥漢語史論》，廈門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

行的音釋比較工作。根據研究，這些杭泉漳福音，就是「杭泉漳福」方音。歷經兩百多年，現代泉州音、漳州音、福州音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聲、韻、調的變化以及文白異讀的分野與《東音譜》所記18世紀的語音已有一定的差別，但基本面貌變化不大。求同存異，《東音譜》仍然具有重要的漢語方音史研究價值，最起碼提供了真實的歷史文獻依據。新井白石也可以說是純粹地站在漢語方言學立場做漢語研究的最早的學者之一。

至於小川尚義擬音的結果是否比高本漢更合理，這也要重新考慮，因為涉及的内容很多，也比較複雜，我們將另行撰文加以討論這個問題。

（三）戰前日本唯一的漢學家實在非小川尚義莫屬的觀點也是不對的。洪惟仁教授說：「要說戰前日本唯一的漢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然而研究伊沢的專著、專文連篇累牘，研究小川的鳳毛麟角，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伊沢主要的中國語研究、出版是在日本進行的，而小川尚義主要的漢語研究與出版是在臺灣進行的。」（36頁）

這裏的「戰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1939年，還是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1931年以前，抑或是日本「全面侵華」的1937年以前？再就是中日甲午戰爭之前？具體所指並不清楚。無論取哪一種說法，所謂「日本唯一的漢學家實在非小川莫屬」的理論是令人生疑的。洪教授所說的「漢學家」似乎是以「中國漢學」為研究對象的學者，那所指的範圍就十分廣泛了，涉及的領域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文學、語言、哲學等。以小川尚義研究的領域而言，他所研究的範圍主要指的是漢語與南島語。這裏當然指的是漢語研究了，並不包括南島語。以日本研究漢語的歷史而言，即便是取1931年之前的「戰前」，「漢學家」也是舉不勝舉的，比如以文字論，有高田忠周《漢字原理》（1904）；以語法論，有岡三慶《岡氏之支那文典》（1887）、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兒島獻吉郎《漢文典》（1903）；廣池千九郎《支那文典》（1904）、信原繼雄《清語文典》（1905）、石山福治《中國語文法》（1908）、宮錦舒《中國語文典》（1912）；以音韻論，有岡本保孝《韻鏡考》（1850）、大島正健《支那古韻考》（1898）、大矢透《周代古音考》（1914）和《韻鏡考》（1924）、以及滿田新造《支那音韻歷史的研究》（1914）、高畑彥次郎《支那語語言學研究》（1928-1930）、有坂秀世《音

韻論》（1930）等；以方言論，有俣野保和《臺灣日用土語集》（1895）、兼松磯熊《臺灣語發音學》（1899）、御幡雅文《滬語便商》（1908）等。由此，日本漢學家眾多也是客觀事實。

在當時，日本學者對小川尚義閩南語成果推重的也是有的，只不過洪惟仁教授不了解罷了。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1908）「序論」談到「中國語研究的學術進展程度」時，認為：「現代中國語研究成果，有兩本書值得一提，H. A. Giles《華英字典》（1892）和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1907）。《華英字典》比較駁雜，而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值得推重。《日臺大辭典》卷首揭示了中國各地方語音比較研究的一些情況。卷末所附臺灣地名，類推顯示了一些規律。是有關『南清』語言研究『不二辭典』。有關北清語言方面，除了《華英字典》之外，還沒有挖掘出來。古代中國語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國的俞樾、王先謙、孫詒讓；日本的星野博士、白鳥博士、市村博士；歐洲學者是Chavande、F. H. Irth。但他們學術方向往往以經學、史學、文學為主，語言方面研究是次要的，屬於文獻學的語言學研究，不能稱為真正的語言學研究。現代中國語語言學研究還處於準備階段。」<sup>6</sup>後藤朝太郎對《日臺大辭典》評價之高，反映之迅捷，理解之深刻，這可以為洪惟仁教授的說法提供一個相反的證據。日本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個內閣首相，親自為《日臺大辭典》題寫「意因言通，言因文傳」八字，加以讚揚。日本臺灣總督後藤新平撰寫「序言」推介，亦可見日本政府高層對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的重視程度超出我們想像的，並非洪惟仁教授所說的那樣「寂寞無聞」。1941年之前，日本許多學者也十分重視小川尚義閩南話和南島語研究成果，比如上田萬年《國語學十講》（東京：通俗大學會，1916）專門設「臺灣語」一節，在介紹臺灣現有語言分佈時，強調了調查的重要性，而涉及「支那語」，包括講方言分佈與人數情況，則直接了當引用《日臺大辭典》序言成果，以之為依據，亦可見重視小川尚義研究程度（78-79頁）。權威的《早稻田大學和漢書目》（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和漢圖書分類書目》（五），1941）「語學之部」第三章「朝鮮語、臺灣語」中「臺灣語」部分列有經典性參考文獻《臺日大辭典》（小川

<sup>6</sup> 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博文館，1908年發行，被列為日本帝國百科全書之中。



尚義）、《日臺大辭典》（小川尚義）、《黠蕃語集》（臺灣總督府飯島幹太郎）、《臺灣高砂族傳說集》（小川尚義、淺井惠倫合作）、《臺灣人種及言語》（小川尚義與移川子之藏合作）、《臺灣藩語數詞用法二例》（小川尚義）、《臺灣藩語文書》（村上直次郎）、《方位名稱和民族移動以及地形》（移川子之藏）八種（73頁），大部分是和小川尚義相關的。1942年之後就更多了，比如涉及到臺灣閩南話，後藤朝太郎著《佛印泰支那の言語交流》（東京：大東出版社，昭和十七年六月（1942））再一次推重小川尚義的研究（267-269頁）。魚返善雄《日本語と支那語》（東京：慶應出版社，昭和十九年（1944）二月）稱讚小川尚義《日臺大辭典》是「驚人的業績」（368頁）。可見，日本「語學」學術界對小川尚義的成果是非常推崇的。

（四）小川尚義漢語比較研究不是唯一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洪惟仁教授說：「在戰前的這種背景下，小川尚義的這篇漢語比較研究遂成為戰前日本人唯一的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然而這篇論文竟然被附在《日臺大辭典》的緒論裏，小川在寫過這篇論文之後沒有再寫過其他的漢語語言學論文，當時也沒有其他的日本人跟著寫出什麼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39-40頁）。

我們理解洪惟仁教授這裏所說的「漢語比較」，主要指的是閩南語語音和日本漢字音的比較。這和洪惟仁教授在本篇論文其他段落所說的類似觀點基本一致，比如洪惟仁教授說：「出現以前的1907年即發表了這篇漢字音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而且不論在中國、日本或歐洲，小川尚義都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最前鋒」（44頁）。但洪惟仁教授又說：「他在總督府的工作雖然是臺灣語辭典的編纂，但對閩南語研究的貢獻主要是辭彙的搜集，有關臺灣閩南語音韻的描寫、分析及閩南語方言的比較研究，雖然也有一些成果，畢竟沒有什麼突出之處。他在漢語方面的研究，最突出的應該是發表在《日臺大辭典》緒言的有關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可是這篇研究從來沒有受到學界的注意，當然也沒有任何學術影響力。而實際上他卻是第一位以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的語言學家。（6頁）」很顯然，一褒一抑，也讓人不知所措，是個充滿了矛盾，前後邏輯難以照應的觀點。

按，洪惟仁教授所謂小川尚義附在《日臺大辭典》的緒論之中論述內容，是

「戰前日本人唯一的一篇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的觀點實在有些牽強。如果還是取1931年之前「戰前」說法的話，我們看到，日本學者發表的純學術的漢語語言學論文不計其數。比如漢語音韻學，其上古音研究有後藤朝太郎《〈說文〉反映的音韻現象》（《史學雜誌》19.6-12；（1909）；中古音研究，岡井慎吾《所見〈篆隸萬象名義〉》（《日本語聲調》，1928）、《關於王氏刊本〈切韻〉》（《藝文》15.12，1924）、《關於唐寫本〈唐韻〉》（《藝文》2.10，1911）；大島正健《進行「享祿版〈韻鏡〉」校訂的理由》（《國學院雜誌》19.1，1913）、《〈韻鏡〉的諸轉內外開合校訂》（《國學院雜誌》第26卷第7號）等論文。以日本漢字音為切入點考訂《韻鏡》語音。岡井慎吾《〈韻鏡〉學書目解題》系列論文（《國學院雜誌》第11卷12號至第12卷第10號，1906）對《韻鏡考》涉及到的《韻鏡》研究著作進行考訂，又補充了許多《韻鏡考》未涉及到的新的材料，包括許多校勘性質的著作。關於漢語近代音，日本《東洋學報》1913年第3卷發表金井保三的《關於〈中原音韻〉》一文，是迄今為止一般學者所能見到的20世紀日本最早系統研究《中原音韻》的論文；滿田新造發表了《中原音和南京音》（《藝文》第9年第7號，1918）、《〈詞韻〉即晚唐音，是近世音》一文（《藝文》第10年第2號，1919）、《近世中國語音的發生》（《藝文》第10年第12號，1919）等系列論文，頗具影響力。大矢透有《〈切韻指掌圖〉為司馬溫公偽託考》（《國學院雜誌》第25卷4號，1893）等論文。專著，比如石山福治就有《考訂中原音韻》（東洋文庫論叢1，1925年7月）、《支那現代音源流考》（支那研究社，1923年）等。

元田修三《日韓語比較研究史》（《國學院雜誌》第29卷9號，1893）回顧日韓語比較研究的歷史，仍然與漢語音韻學的研究緊密結合，強調漢語與日語、朝鮮語語音關係的研究重要性。小倉進平相繼發表了《關於朝鮮的日漢滿蒙語辭書》（《朝鮮與滿洲》83號，1914年6月）與《關於朝鮮日漢滿蒙語讀本》（《東洋學報》4之2期，1914年7月）、《關於朝鮮中國語學》（《朝鮮與滿洲》110號，1916年9月）三篇重要論文，還有專著《朝鮮語學史》（刀江書院，1920）等，對朝鮮漢字音與漢語語音關係問題提出了比較成型的看法。渡部薰太郎《滿洲語、女真語和漢字音的關係》（《亞細亞研究》第2號，1925）強調了滿語、女真語和日本漢字音之間的「相似性」，進而說明漢語近代語音的性質。羽田亨《漢番對音千字文

斷簡》（《東洋學報》13，1923）、內藤湖南《拉薩唐蕃會盟碑》（《研幾小錄》，京都：弘文堂）、宮本正尊《對敦煌出土大乘中宗的見解及其研究》（《宗教研究》新6：4，1929），嘗試的是漢藏對音譯音研究，讓人耳目一新，比如羽田亨，把敦煌寫本材料的藏文對音用羅馬字譯寫出來，逐一同北京音比較。後來的中國學者羅常培又有所發展，利用更多的漢藏對音材料撰成《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一書。高田時雄《依據敦煌資料研究中國言史》（創文社，1988）對羽田亨等人的歷史性貢獻予以了高度評價。<sup>7</sup>「《日臺大辭典》緒言的有關漢語方言的比較研究，可是這篇研究從來沒有受到學界的注意」的觀點，由後藤朝太郎《現代支那語學》（1908）「序論」所述，也是不符合實際的。

（五）小川尚義「古今漢字音對應表」不是世界範圍內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張表。洪惟仁教授說：「小川尚義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還可以搜集更多更正確的資料做得更精密一些，可是這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張漢語主要方言的古今漢字音對應表，在小川尚義以前沒有任何人做過。小川沒有做好的，後來者，做為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基礎工作，這是必須做的。可是自來漢語學界只有各別方言的古今音比較表，做過所有漢語主要方言及域外漢字音的古今音比較表的，直到目前為止也只有小川尚義做得最完全，高本漢雖然也做了一些，但只做了部分聲母，韻母部分，《方音字彙》雖然也可以算是古今音比較表，但不能算是古今音對應表。也就是說，在漢語方言古今音比較的全面研究這方面，至今還未有人超過小川尚義的成就。」（44頁）

以古今漢字音對應表而論，日本沙門盛典《新增〈韻鏡〉易解大全》（1715，楊文軒子刊本）列有大量的語音表格，其中《五韻拗直五位之圖》，將日語假名《五十音圖》與《韻鏡》「喉牙舌唇齒」五音相吻合。而《四十三轉總標七音總括之圖》，將五音、五行、五時、五臟、無色、五常與「喉牙舌唇齒」等七音配合，表明自己的設計理論依據與此直接相關，這其實也是以表格形式研究漢語中古字音對照表格。日本文雄《磨光韻鏡》（1744）「漢音、吳音、華音」對照表算不算是中古音和近現代音的對照表？日本太田全齋《漢吳音圖》（1815）、黑川春樹《音

<sup>7</sup>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

韻考證》（1862），乃至於大島正健在《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系列論文（《國學院雜誌》第五卷第2號至第六卷第2號，1898-1899）中把《韻鏡》音、梵漢對音、「現實」的官話、江南音、福州音、廈門音、廣東音進行對比算不算是中古音和近現代音的對照表？就是在日本之外，韓國也有漢字音表格，比如，中國北宋邵雍《皇極經世·聲音唱和圖》傳到了朝鮮半島，出現了像崔錫鼎（1645-1715）《經世訓民正音圖說》、黃胤錫（1729-1791）《理藪新編》（1744），以及申景浚（1712-1781年）《韻解訓民正音》（1750）中《漢字音韻圖》（《經世聲音數圖》）等與之相關等韻圖著作，表格形式非常明顯。由此，我們認為，洪惟仁教授得出「古今漢字音對應表」「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張表」結論還是不符合史實的。

（六）小川尚義不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並且，他的擬測並不比高本漢更合理。洪惟仁教授說：「雖然古音擬測不是小川尚義的主要目的，可是他是第一個進行全面的漢語方音比較的人，他以語音比較進行聲母、韻尾擬測的研究方法和高本漢是一樣的，他所擬測的結果，從現在看來，竟比高本漢更合理。而小川文發表的年代（1907）比高文（1915）早了八年。當然就整個格局來說，高本漢無疑地更宏偉而影響深遠，可是我們不能不佩服小川尚義的真知灼見。」（45頁）「出現以前的1907年即發表了這篇漢字音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而且不論在中國、日本或歐洲，小川尚義都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最前鋒」（44頁）「雖然小川尚義不為西方學者所知，但是他對西方學者的研究非常瞭解，他緊緊跟著時代的步伐前進，他的漢字音比較研究，在當時是走在時代的尖端。我們知道中國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1928年趙元任發表《現代吳語的研究》才開始的；至於日本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戰後的1946年「中國語學研究會」成立以後的事。可是小川尚義在高本漢的論文（1915）未出現以前的1907年即發表了這篇漢字音比較研究。也就是說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而且不論在中國、日本或歐洲，小川尚義都堪稱是現代漢語語言學的最前鋒。」（44頁）

小川尚義是第一個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研究的東方人嗎？如果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傳入臺灣，並用現代語言學手段研究臺灣地區方言而言，這個論斷也是

可以再議的，因為在小川尚義來臺之前，伊沢修二已經開始研究臺灣閩南語，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況且，伊沢修二還發表了《日清字音鑒》、《視話應用音韻新論》、《支那語正音發微》等漢語現代語音學著作，現代語言學理論與實踐均有重要創獲，已經為中日兩國學者所矚目。伊沢修二是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語言學政策的制定者，而且對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語言學政策貫徹採取了許多措施，這對臺灣漢語語言學研究方向的確定影響很大。小川尚義作為伊沢修二殖民語言教育政策的主要執行者，成為日本殖民時期臺灣語言學的開拓者之一，這是需要肯定的。他的主要貢獻，正如李壬癸院士所說：是調查和研究臺灣地區的語言，包括漢語方言和南島語言，前後40年（2007）。但卻也並不能因此而忽視了伊沢修二在臺灣所進行的開拓性工作。<sup>8</sup>

此外，大矢透（1850-1928）、後藤朝太郎（1881-1945）與小川尚義幾乎同時來到臺灣任職。大矢透（1850-1928）以研究日本上代語歷史變遷和漢語音韻學而知名。1896（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242頁，認為是1896年，南天書局，1927/1997）到1901年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職員，與伊沢修二共事。1909年任文部省國語調查委員會委員。1916年獲得日本帝國學士院獎勵。1925年以《仮名乃研究》為學位論文，獲得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大矢透主要著作：『日清字音鑑』，與伊沢修二共著，並木善道，1894；『仮名源流考』，國定教科書共同販売所，1911；『周代古音考』，國定教科書共同販売所，1914；『音図及手習詞歌考』，上田萬年監修，大日本圖書勉誠社，1918；『韻鏡考』，1924；『隋唐音図』，大村書店1932等。後藤朝太郎的《漢字音系統》（六合館，1902年）等漢語音韻學著作在日本等國家影響很大。就當時來看，大矢透、後藤朝太郎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小川尚義。大矢透作為日本國家語言規劃的負責人，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日本有人稱後藤朝太郎是日本「中國通」第一人，主要是他的有關中國研究的著作非常多，比如《現代支那語學》（1908）之外，還有著名的《佛印泰支那の言語交流》（1942）等，而且，產生了極其廣泛的影響。與之相比，在當時的日本語言學

---

<sup>8</sup> 李壬癸《臺灣語言學先驅——小川尚義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7年9月8日。

學術界提到小川尚義的不多，說明他在日本學術界的影響力是十分有限的。

如果將視界離開臺灣地區，在小川尚義之前，也有很多學者運用現代語言學眼光研究漢語。就是在日本，也有許多學者採用現代語言學方法進行漢語比較研究的，比如大島正健在《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系列論文（《國學院雜誌》第五卷第2號至第六卷第2號，1898-1899）中把《韻鏡》音、梵漢對音、「現實」的官話、江南音、福州音、廈門音、廣東音進行對比。具體的描寫，用羅馬字母標音。過去用羅馬字母標音取其近似，現在力求精確。英國人威妥瑪，他的《尋津錄》（1859）、《語言自邇集》（1867）就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北京話，用羅馬字標記中國語比較科學。威妥瑪對北京官話語音研究的貢獻，許多學者有論述，比如張衛東就寫有《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1998）、《從〈語言自邇集·異讀字音表〉看百年來北京音的演變》（2002）等論文加以論述，亦見其研究的科學性。<sup>9</sup>威妥瑪的研究影響了許多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產生了大量的漢語語言學著作，這是很明確的，勿需贅述。

小川尚義是不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域外漢字音、漢語方言比較的學者？在小川尚義之前，利用羅馬字標記和構擬漢語中古音的日本學者不少，大島正健，《漢音吳音和中國音的比較》系列論文自不待言。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金港堂，1898），其「序論」和「凡例」說：「論及音義，每個漢字存在著固有音義，但每個字一音一義的現象很少，一字數音、一音數義、多音多義很多，卻帶來了一些學者在解釋上的謬誤。《字彙》區別本音和別音；《音韻日月燈》『韻母卷』，在每個字的右側，以『眾（一字數音）獨（一字一音）之字』加以區別。論及四聲，中國之外學者認為是漢字字音區別的一個重要方面。《五音集韻》則區別六聲：上平、中平、下平、上聲、去聲、入聲。描述了中國各地「四聲的分佈」情況。論及字音，自古以來，字音不是一層不變的，變化次序應該證之於書面文獻（文書），楊升庵、顧炎武、呂維祺、江永等十分嚴密，但有隔靴搔癢之感，古韻

---

<sup>9</sup> 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第4期；《從〈語言自邇集·異讀字音表〉看百年來北京音的演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

今韻之別、通韻葉韻之說、等韻等應該論及。加上本土之音，有日本漢音吳音朝鮮音安南音四音，無論如何，是比較研究的好材料。此外，中國各地『土音』不同，亦不可等閒視之。廣東、廈門等方音與古代字音相近。近來歐人有關這方面的論述很多。」漢字音比較意識明確。

豬狩幸之助《漢文典》（1898）所附《〈韻鏡〉解釋》中古音擬音也更能說明問題。<sup>10</sup>在另一篇文章中，我們會有所說明。豬狩幸之助研究漢語中古音，一方面依據《韻鏡》及《廣韻》文獻，另一方面，也吸收了歐美學者研究《切音指南》，以及他們所搜集的十一種方言及日本、越南、朝鮮漢字音成果文獻。理論與方法明確，文獻也很豐富，總計十四種，比小川尚義《韻鏡》研究還多了一種。《〈韻鏡〉解釋》早於小川尚義著作9年發表，其「擬音」效果一點也不遜於小川尚義。可以說，小川尚義是在豬狩幸之助、大島正健等學者基礎之上研究漢語中古音的，其學術理論來源十分清楚。

《支那語學》，月刊，創刊於明治四十年（1907），只印了12期。1908年5月終刊。創刊號的編輯者是泉水信太郎，發行者是田中慶太郎，印刷者是本間季勇，發行所是支那語學研究會。設置語音欄目，語音，把和日語語音音節性質區別作為講解的突破點。比如日本人學習的難點是北京官話的聲調，就從講什麼是四聲，以及四聲之別開始；而聲母把日語語音所不具有的區別性特徵，比如送氣音和不送氣音作為重點。這些都是學習北京官話語音必須掌握的知識。就是與小川尚義同時代的日本學者後藤朝太郎，1906年完成，1908年發表的《現代支那語學》（博文館）一書，也全面地論述漢字音比較理論，涉及到了許多中國方言，其系統性也遠遠地超出了小川尚義。《現代支那語學》被列為日本一百年來經典性的漢語研究著作。所以，洪惟仁教授所謂小川尚義是漢語語言學史上第一個進行域外漢字音、漢語方言比較學者的結論也是不正確的。<sup>11</sup>

<sup>10</sup> 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金港堂，1898；支那語學研究會《支那語學》，月刊，創刊於明治四十年（1907），只印了12期。1908年5月終刊。創刊號的編輯者是泉水信太郎，發行者是田中慶太郎，印刷者是本間季勇。

<sup>11</sup> 李無未《漢語現代語言學理論體系的初次構建——日本〈現代中國語學〉（1908）的意義》，《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1期。

稍後於小川尚義日本學者對《韻鏡》中古音「擬音」最為突出的是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亞堂，1910）和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啟成社，1912）。<sup>12</sup>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第五篇《音韻》與豬狩幸之助《漢文典》附錄《〈韻鏡〉解釋》「三十六字母條」擬音一樣，其「字音類別」（第119-）討論吳音、漢音、唐音擬音問題。可謂細緻入微。

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分八章：七音考、內轉外轉之解、開轉合轉之解、等韻直拗之說、二百六韻考、音韻圖使用法及漢吳音還原法、《韻鏡》和假名遣、《韻鏡》和反切法。其「七音考」也涉及到三十六字母擬音。

（七）小川尚義中古音「構擬」以《韻鏡》音為依據，如果拋開「呈顯閩南語在漢語方言中的特徵」這個「代言人」角色。徐通鏞說：語言的空間差異則是有形的，從語言的空間差異探索語言的時間發展，就成為歷史比較法的一條重要原則。<sup>13</sup>《韻鏡》音是否能夠代表漢語中古音有爭議，這就很難說代表閩南語語音的中古音「層次」。<sup>14</sup>

## 二、關於高本漢漢語音韻研究史實的辨正

（一）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不是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洪惟仁教授說：「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應該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東京：文求堂）開始萌芽的，通觀戰前的日本中國語學界，可以說沒有足以稱為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39-40頁）

這裏有兩個問題：其一、日本本土的現代漢語語言學是否為應該從1937年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文輯為《支那言語學概論》開始萌芽的？其二、通觀

<sup>12</sup> 佐藤仁之助《速成應用漢學捷徑》，東亞堂，1910；大島正健《韻鏡音韻考》，啟成社，1912。

<sup>13</sup>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

<sup>14</sup> 徐通鏞《歷史語言學》136頁，商務印書館，2008年7月。



戰前的日本中國語學界，是否可以說沒有足以稱為「高本漢式」的漢語語言學的學術研究？

第一個問題。洪惟仁教授的這種說法也是有問題的。日本學者介紹和評述高本漢漢語音韻學著作在岩村忍、魚返善雄之前就有人進行。比如滿田新造《カ-ルグレン氏古韻研究の根本思想を評す》（《東洋學報》13-4，1924年；14-1，1924年）以批判高本漢漢語音韻學思想而聞名。高畑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副題是《音聲史的研究》，以下稱《音聲》，《藝文》第19年第8號，昭和3年（1928）8月第21年第12號至昭和5年（1930）12月，22期）則全面而系統介紹了高本漢的漢語音韻學體系；1930年12月有坂秀世向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提交論文《上代音韻考》的提綱，其中《音韻論》，也是與高本漢討論上古音、中古音問題有關（慶谷壽信《有坂秀世〈音韻論〉》、《有坂理論の展開》系列論文（東京都立大學人文學部《人文學報》197、253期；金田一春彥《有坂秀世〈音韻論〉私觀》，東京大學國語研究室創設百年紀念《國語研究論集》1327-1340頁，1998年2月）。岩村忍、魚返善雄《支那學者カ-ルグレンの業績》（《日華學報》56、57號，1936年）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學說也有所評價。這些都是日本學者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理論全面引入之始，更是日本邁向現代的漢語音韻學的一個轉捩點，僅僅提岩村忍、魚返善雄合譯高本漢的論著肯定是不夠的。

第二個問題。岩村忍、魚返善雄之前，滿田新造、高畑彥次郎、有坂秀世等都進行過高本漢式，甚至是超越高本漢式的漢語語言學研究。以高畑彥次郎《支那語の言語學的研究》（1928-1930）為例，《音聲》內容主要有：音聲史研究的材料、音聲史的研究、《廣韻》反切下字的研究、《廣韻》反切上字的研究、關於二百零六韻、四聲的研究、《切韻》資料研究。對《廣韻》的構擬與研究占了全文相當大的篇幅。<sup>15</sup>

《音聲史的研究》對高本漢研究進行補充與修訂主要內容是：十分重視《廣韻》文獻的鑒別與運用，變《廣韻》「第二手資料」為「第一手資料」；在具體構擬《廣韻》音時，除了以高本漢的方音材料為依據外，還吸取其他學者方言研究的

<sup>15</sup> 李無未《日本漢語音韻學史》，商務印書館，2011。

成果，進一步豐富自己的方言材料；等韻圖運用回歸中國學者陳澧等研究思路上來，真正明確等韻圖「辨韻析等」的客觀依據功能；對《廣韻》反切音系歸納吸取了中國學者陳澧的處理方法，注意音類區分的系統性；在語音分析上，注意對中國明清以及現代學者的音韻學分析的引述，並作為研究的一項十分重要內容，說明作者熟悉中國學者的學術文獻與傳統；對高本漢構擬《廣韻》不是簡單地全面接受，而是有意識地補充與修訂高本漢的《廣韻》構擬。

但《音聲史的研究》對高本漢研究進行補充與修訂還存在著一些局限性：高畑彥次郎《音聲》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許多看法上難以擺脫高本漢思維模式的束縛，使得自己的研究明顯帶有「跟著跑」的痕跡；在許多問題上，限於當時的認識水準，還停留在一般層次的理解上，比如「重紐」問題；限於活的方音材料匱乏，證據明顯不足，有待於後人的進一步修訂與完善。

雖然如此，高畑彥次郎《音聲史的研究》對高本漢研究進行補充與修訂具有重要意義：從漢語中古音構擬入手，全面介紹高本漢理論與方法，並且融入自己的研究成果，改變了日本漢語音韻學研究的舊有面貌，引起了日本漢語音韻學界的很大震動，形成了以往所不曾見到過的學術格局，很顯然，對日本漢語音韻學研究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音聲》大量吸取中國學者的古今漢語音韻學研究成果，在當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即高畑彥次郎正確評估中國學者的漢語音韻學研究，實際上，是尊重學術研究的客觀歷史事實，直接推動了中日漢語音韻學研究的學術交流。

高畑彥次郎《音聲史的研究》之後，一些日本學者仍然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學說進行補充與修訂，比如：岩村忍《カルグレンの支那語學方法論》（《日華學報》56、57号，1936）、有坂秀世《カルグレンの拗音說を評す》（《音聲學學會會報》4、9、51、53、58，1937.11-1939.7）、《音韻論》（三省堂，1940年2月）、神田喜一郎《karlgren氏の著述》（《中國語學》20號，1948.10）等。

其中，有坂秀世的研究非常突出。比如印證「重紐」的存在。據平山久雄先生考察，「重紐」是由中國學者陳澧提出的，卻是由日本學者橋本進吉《國語音聲史の研究》（1927）開始區別音值的，但具體論證還是由有坂秀世等學者，而不是高本漢。有坂秀世《萬葉假名雜考》（《國語研究》3、7，1935）、《關於漢字的朝

鮮音》（《方言》6。4，1936）、《カ-ルグレン氏の拗音説を評す》（《音聲學學會會報》4、9、51、53、58，1937.11-1939.7）、河野六郎《朝鮮漢字音的特質》（《言語研究》3，1939）等論文對這個問題進行論述。其中，有坂秀世（1937.11-1939.7）最為詳盡。主要證據是：日本「萬葉假名」裏母音有甲類與乙類的區別；朝鮮字音與越南漢字音等材料，存在三等與四等的不同，由此，推斷重紐是介音 i（四等）和 i（三等）的對立。可見，日本學者在一些問題上的研究已經很深入了，開始超越了高本漢。<sup>16</sup>

有坂秀世《音韻論》第三部第一篇「總論」「漢字音（古代中國語の音韻組織）」一章更是在「緒論」、「紐論」、「韻論」、「古音論」「音節的構造」各節中力圖全面補充與修訂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學說，可以說，在許多方面超越了高畑彥次郎《音聲史的研究》研究。

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學說之外，其他一些理論與方法也很盛行。比如：日本傳統漢語音韻學的「比較」研究，像大島正健《支那古韻史》（1929）、大矢透《隋唐音圖》（1931）；還有新的「東洋學」下的「音聲學」的理論與方法，以及傳統考據學的理論與方法，仍然佔有相當的份量，或多或少影響著漢語音韻學研究的進行，其影響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二）最先將高本漢學術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的不是羅常培。洪惟仁教授稱，最先將高本漢學術研究成果介紹給中國的是羅常培（羅莘田《中國音韻學的外來影響》，《東方雜誌》32（14）：35-45，1935）（33頁）。按，中國學者將高本漢漢語音韻學成果介紹給中國，羅常培肯定不是第一個人，他之前有許多學者已經進行。證據是：1. 林語堂翻譯的珂羅倬倫（Bernhard Karlgren），就是後來稱作高本漢的《答馬斯貝嚕（Maspero）論〈切韻〉之音》，完成於1923年7月，刊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三號。又收於林語堂《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5月。2.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的諧聲說》，趙元任翻譯，北京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論叢》第1卷第2號，1927年9月。3. 《評珂羅倬倫Karlgren中國古韻研究之根本思想》，滿田新造著，朱芳圃譯，《國立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

<sup>16</sup> 平山久雄《重紐問題在日本》，臺灣《聲韻論叢》第6輯，1995年。

週刊》第6集第67、68期合刊，1929年2月13日。4.《珂羅倭倫諧聲原則與中國學者研究古聲母之結論》，朱芳圃譯，《東方雜誌》第26卷第21號，1929年11月10日。5.《上古中國音當中的幾個問題》，高本漢著，趙元任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1本第3分，1930年。6.《中國古音〈切韻〉之系統及其演變（附國音古音比較）》，高本漢著，王靜如譯，《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2分，1930年8月。7.《珂羅倭倫考訂〈切韻〉韻母隋讀表》，林語堂，《語言學論叢》，上海開明書店，1933年5月。其他像馮承鈞（1929）、張世祿（1931）、陳定民（1932）、唐虞（1934）、賀昌群（1934）等都對高本漢漢語音韻學做過介紹。<sup>17</sup>

（三）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的「非對稱性」。洪惟仁教授將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進行比較，其目的就是要突出小川尚義在漢語中古音「構擬」上的貢獻，進而確立他在漢語中古音研究史上的崇高地位，主觀願望當然是好的，但我們觀察到，其「比較」的客觀效果並不如人意，比如，在他所進行的比較過程中，只見到簡單的「類比」現象與結論，但深層次的理論與方法「關係」並不清楚。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局？我們認為，主要在於其兩者的「比較」存在著明顯的「非對稱性」，即二者沒有嚴格漢語語言學意義上可比性。如果硬是要「拉郎配」，其結果註定是不會「圓滿」的。

### 三、關於伊沢修二漢語音韻研究史實的辨正

除了小川尚義、高本漢之外，因為牽涉到小川尚義的學術研究，必須要提及與之相關的伊沢修二漢語研究情況。但有關伊沢修二的一些史實，也是需要辨正的。洪惟仁教授說：「以早稻田大學教授六角恒廣先生為例，他是大家公認傑出的中國語學家，1961年他出了一本名著《近代日本の中國語教育》。在這本書中，臺灣話被歸入中國語之中，可是臺灣話只占5頁的篇幅，並且發生嚴重的錯誤，他竟說『臺灣最通行的中國語方言是閩南語，其次是廣東語、客家語』。他不知道戰前日

<sup>17</sup> 馬軍《中國學術界譯介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篇目彙編》，《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六輯1-1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本人在臺灣所謂的『廣東語』就是『客家語』。他把民間學者伊沢修二捧為戰前唯一科學地、實證地研究中國語的學者，但是對語言學者小川尚義不說一句話。」（36頁）

伊沢修二是民間學者嗎？伊沢修二只是比其他的門外漢所謂中國語教材編者多懂得一些語音學的知識，他並沒有做過純語言學的漢語研究？

維基百科介紹說：伊沢修二（いさわ しゅうじ、舊字體：伊澤、1851年6月30日（嘉永4年6月2日）－1917年（大正6年）5月3日）は明治時代の日本の教育者、文部官僚。近代日本の音楽教育、吃音矯正の第一人者である。號は楽石。信濃國高遠城下（現在の長野県伊那市高遠町）に高遠藩士の父・勝三郎、母・多計の子として生まれる。幼名は彌八。父は20俵2人扶持の低支給の下級武士のため極端な貧乏暮らしだった（事実上1年4人で分け與え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ととなっている）。1861年（文久1）から藩校進徳館で學び、1867年（慶応3）に江戸へ出府。ジョン萬次郎に英語を學ぶ。萬次郎が歐米に出張すると、1869年（明治2年）に築地に転居したアメリカ合衆國長老教會の宣教師カラゾルスから英語を學ぶ。京都へも遊學して蘭學などを學ぶ。同年には藩の貢進生として大學南校（のちの東京大學）に進學する。1872年（明治5）には文部省へ出仕し、のちに工部省へ移る。1874年（明治7）に再び文部省にもどって愛知師範學校（現在の愛知教育大學）校長となる。1875年（明治8）には師範學校教育調査のためにアメリカ合衆國へ留學、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州ブリッジウォーター師範學校（英語版）で學び、同時にグラハム・ベルから視話術を、ルーサー・メソンから音楽教育を學ぶ。同年10月にはハーバード大學で理化學を學び、地質研究なども行う。聾啞教育も研究する。1878年（明治11）5月に帰國。1879年（明治12）3月には東京師範學校（現在の筑波大學）の校長となり、音楽取調掛に任命されるとメソンを招く。來日したメソンと協力して西洋音楽を日本へ移植し、『小學唱歌集』を編纂。田中不二麿が創設した體操伝習所の主幹に命じられる。1886年（明治19）3月、文部省編輯局長に就任。1888年（明治21）には東京音楽學校（現在の東京芸術大學音楽學部）、東京盲啞學校（現在の筑波大學附屬視覚特別支援學校）の校長となり、國家教育社を創設して忠君愛國主義の國家教育を主張、教育勅語の

普及にも努める。内閣制度が発足し、1885年（明治18）に森有禮が文部大臣に就任すると、教科書の編纂などに務める。1890年（明治23年）に國立教育社を組織して國家主義教育の実施を唱導し、翌年に文部省を非職となつてからは更に國立教育運動に力を注いだ。その後、1892年（明治25）8月に國立教育期成同盟を結成して小學校教育費國庫補助運動を開始する。1894年（明治27）の日清戦争後に日本が臺灣を領有すると、臺灣へ渡り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心得に就任、植民地教育の先頭に立っている。1895年（明治28）6月に、臺北北部の芝山巖（しどんがん）に小學校「芝山巖學堂」を設立。翌1896年（明治29）1月、伊沢が帰國中に、日本に抵抗する武裝勢力に同校が襲撃され、6名の教員が殺害される事件が発生した（芝山巖事件）。1897年（明治30）には貴族院勅選議員。晩年は高等教育會議議員を務めたほか、吃音矯正事業に務め、1903年に樂石社を創設。1917年、脳出血のため67歳で死去。

其語言學著作：『視話応用 清國官話韻鏡』，1905年1月増訂再版；『日清字音鑒』（與大矢透合作），並木善道，1895年6月；『視話応用 清國官話韻鏡音字解説書』，樂石社，1904年12月；『視話応用 東北発音矯正法』，樂石社，1909年4月；『視話応用 國語正音法』樂石社，1910年6月；『支那語正音発微』，樂石社，1915年10月；『視話応用 支那語正音韻鏡』，樂石社，1916年3月。

伊沢修二受過蘭學薰陶，又留學美國，在當時的日本語言學界有幾個人會具有如此海外語言學學習經歷和背景？他所擁有的顯赫地位非同尋常，還出版過在世界漢語教育史上影響巨大的《視話応用清國官話韻鏡》、《支那語正音発微》等著作，日本許多學者予以高度評價。比如新村出《上水内郡聲音學講習筆記》（上水内郡，1906）就認為，日本西洋的音韻學引入，就是從伊沢修二1878年到美國向貝爾學習「視話法」開始（10頁）。<sup>18</sup>石山福治《最新支那語學研究法》（（1919）講「中國寫音文字的由來」，彰顯中外學者，比如王照、伊沢修二等創制北京官話標記符號的貢獻，讓讀者瞭解現代漢語字音標記產生的過程，加深對「注音字母」

<sup>18</sup> 新村出《上水内郡聲音學講習筆記》，上水内郡，1906。

實際意義的理解（129-132頁）。<sup>19</sup>大西雅雄《音聲學史》（1934）將日本語音學史分為三期，即準備時代、覺醒時代、活躍時代。其中進入現代語音學的覺醒時代代表性人物，第一個是山田美妙，他在1893年運用現代語音學理論與方法標記日語，比如用羅馬字標記日語辭彙。第二個就是伊沢修二。伊沢修二1879年在日本開始研究「視話法」，是最早用現代語音學理論實施教育的第一人（99-102頁）。<sup>20</sup>何盛三《滿洲國語文法——現代中國語：北京官話》（1936）談到中國語記音法，突出伊沢修二、大矢透，以及張滋昉在創制「新表音文字」上的貢獻，尤其是伊沢修二《新音韻論》（明治三十九年（1906）刊）最為突出（41頁）。<sup>21</sup>魚返善雄《支那語の發音和記號》（東京：帝國書院，昭和十九年（1944）十月發行），在「中國語發音參考書」一節中認為，日本人對漢語字音發音結構進行全面分析的著作，第一個就是伊沢修二，其著作就是《日清字音鑒》、《清國官話韻鏡》、《同文新字典》（175-181頁）。埋橋德良《日中言語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太宰春臺、阪本天山、伊沢修二的華音研究》（1999）一書，設專章評介伊沢修二中國語語音研究的突出貢獻，其中與日語比較及漢語實驗語言學研究相關的北京官話語音標記字母的創立，即所謂「繹之以世界共通之記音法，於是支那音韻之原理一旦釋然，有所發明矣」，力圖成為「國際音標」式標記系統，為世界範圍內漢語語音學界矚目，並與中國王照的聲名「齊驅並駕」。其《日清字音鑒》（與大矢透合作，並木善道，1895年6月）等著作，當然為中日學者所關注。<sup>22</sup>羅常培《國音字母演進史》（1934）「注音字母之演進」一章，有所謂「假名系」著作分類，專門設立「日本伊沢修二《支那語正音發微》」進行論述，評價甚高。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1934）說：「王（照）氏官話字母（即京音簡字），源雖不遠而流很長：除

<sup>19</sup> 石山福治《最新支那語學研究法》，東京：文求堂，大正八年（1919）三月。

<sup>20</sup> 大西雅雄《音聲學史》，明知書院，1934。

<sup>21</sup> 何盛三《滿洲國語文法——現代中國語：北京官話》，東京：東學社，1936年9月。

<sup>22</sup> 埋橋德良《日中言語文化交流的先驅者——太宰春臺、阪本天山、伊沢修二的華音研究》，白帝社，1999年11月。日本有關研究著作：上沼八郎《伊沢修二》，吉川弘文館，1962；原平夫《伊沢修二、伊沢多喜男》，伊那毎日新聞社，1967；安藤彦太郎《中國語和近代日本》，岩波書店，1988。

同時的勞（乃宣）氏為其同志外，如日人伊沢修二之《支那語正音發微》（1915）、瀨上恕治之《北京官話萬物聲音》（1906）等，都是外國人紹述官話字母之作。」亦見其影響力之大，所做研究當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sup>23</sup>如此，洪惟仁教授的結論能夠成立嗎？可見，這個結論也是需要重新檢討的。

洪惟仁教授又說，伊沢修二「他是日本漢語學界第一個，也是戰前日本漢語學界略具西方語音學的方法以研究北京話的學者，曾以修改的假名符號正確的標注北京話著為《日清字音鑒》，這是日本第一部北京話的標音韻書，他所用的符號也可以說是中國『國語注音符號』的先驅。」（3頁）

這和前面的說法又不一樣，洪惟仁教授又把伊沢修二「拔高」了許多，也不符合歷史事實，比如伊沢修二不是日本漢語學界第一個研究北京官話的學者。在伊沢修二之前，研究北京官話的學者不少。比如廣部精改編譯威妥瑪《語言自邇集》而命名為《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於1880年出版。《亞細亞言語集·支那官話部》標記北京官話語音，以日語假名及「四圈標調法」取代威妥瑪式拼音及聲調標注形式。其他，像吳大五郎、鄭永邦合作編寫的《日漢英語言合璧》（東京丸善商社，1881）、福島安正《自邇集平仄編——四聲聯珠》（陸軍文庫，1886）等都對北京官話語音系統進行了細緻的描寫，成為今天學者研究北京官話語音的重要資料。伊沢修二《日清字音鑒》之後，北京官話語音研究著作就更多了，比如宮島大八編《清語獨入門》（善鄰書院，1900）等就很典型。

#### 四、餘論

林初梅在《小川尚義論文集》（三元社，2012年11月）「序文」中說：「臺灣近年來日治時期研究的論文，大多欠缺與同一時期日本『內地』學界比較的觀點，因此，有關小川的先行研究雖多，我心中卻浮現不少疑問，例如，當時日本『內地』學界如何定位小川的研究成果？還有，小川和日本『內地』之間的交集如何？

---

<sup>23</sup> 羅常培《國音字母演進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羅常培文集》第三卷，48頁，山東教育出版社，2008年11月；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115頁，商務印書館，1934年初版，2011年再版。



（9頁）」等等，都是沒有解決好的問題。<sup>24</sup>鄭曉峰《評林初梅在〈小川尚義論文集（複刻版）日本統治時期における臺灣諸言語研究〉》（《臺灣語文研究》第7卷第2期131-135頁，2012）提到，林初梅的專論，最重要的推論有兩點：一是小川尚義求學期間，受外籍老師Karl Florenz的影響遠大於上田萬年，二是小川尚義進行臺灣原住民語言研究時日本本土的學術背景。所以，我們認為，小川尚義的學術源流在日本，如果不去看日本和小川尚義的學術源流關係，很顯然，對小川的學術評價就不會到位，這也是明擺著的事實。李壬癸院士也稱，小川尚義是「臺灣語言學先驅」（2007），但還需要理清這種關係。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傳入臺灣，並用現代語言學手段研究臺灣地區方言而言，這個論斷也是可以再議的，因為在小川尚義來臺之前，伊沢修二，甚至於他之前學者等已經開始研究臺灣閩南語，並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日本學者藤井彰三《伊沢修二的臺灣話研究》（《元智人文社會學報》2000年第7期）對此有比較客觀的研究。

小川尚義「構擬」《韻鏡》中古音「發現」與「發明」乏善可陳，完全是繼承和發展前人研究的結果，並無獨創「構擬漢語中古語音」體系的驚人之處。由此，所謂「小川尚義對漢語中古音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定評是不符合實際的。小川尚義與高本漢中古音「構擬」比較存在著如此多的「非對稱性」，比較的合理性也就大打折扣了，這種比較的意義和價值當然也就大大降低了。至於小川尚義「擬音」《韻鏡》中古音與其它方音比較的「邏輯謬誤」，是當時日本明治末期學者「模仿」歐美學者與「創新」過程中不可避免出現的「幼稚病」，其存在著明顯的「邏輯謬誤」並不稀奇。與高本漢漢語音韻學的比較也就顯得不合理據，因為混淆了簡單「擬音」比較與歷史比較語言學「構擬」的性質與概念內涵。此外，站在世界漢語研究史的角度上看，小川尚義之前或同時代學者，對漢語研究的貢獻也不可忽視。必須本著客觀公正的態度而進行研究。

---

<sup>24</sup> 林初梅在《小川尚義論文集》，三元社，2012年11月。

## **Rectification of Main Historical Facts in Research o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by Ogawa and Karlgren -- To Consult with Professor Ang Ui-jin One**

*Li, Wu-wei\**

### **Abstract**

Based on review and comment of 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Japanese scholar Ogawa Naoyoshi and Swiss scholar Bernhard Karlgren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research by Taiwan scholar Ang Ui-jin, we find that there is some intentional overestimation of Ogawa's position in this field, especially the inaccurate research results made by professor Ang in his paper. For instance, in our eyes, it is improper to separate Chinese and Minnan dialect as two subject categories; Ogawa cannot be the first linguist doing research on the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by comparing with Chinese dialec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world-widely; it is inaccurate to state that Ogawa was the only sinologists in pre-war Japan; Ogawa's article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was not the only single pure academic paper in Chinese linguistics; the comparison table of pronunc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y Ogawa is not the first on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Ogawa is not the first oriental scholar apply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modern linguistics to study Chinese; there is obvious logical fallacy comparing Ogawa's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with other Chinese dialects; the starting point of Japanese domestic modern Chinese linguistics is not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 collection of Bernhard's papers compiled by Iwamura Shinobu and Ogaeri Yoshio in 1937; the first scholar who introduced research results of Bernhard Karlgren was not Luo

---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Changpei but Lin Yutang; asymmetries are obvious when it comes to compare the Middle Chinese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by Ogawa and Bernhard respectively; Isawa Shuji is not a folk scholar whose research on phonological experimental linguistics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exerted influence world-widely. We think that Ogawa's academic research source originated from other Japanese scholars, without this basic understanding, our academic evaluation for him will be hardly accurate and objective, the same is the case with comparison with Bernhard's research influence o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world-widely, contributions made by scholars before or contemporary with Ogawa in this field should not be attached little weight and a just and objective attitude is a must in our research.

**Keywords:** Ang Ui-jin, Ogawa Naoyoshi, Bernhard Karlgren,  
rectification of main historical facts

